

文壇巨擘余光中以詩人兼學者的特殊身份，多年來除不斷創作與研究之外，悉心從事翻譯工作，畢生與第十位繆思（即余氏品題為專司翻譯之靈感女神）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永恆之戀。

這場戀愛，無論在學界，文壇，譯壇都令人矚目，聞名遐邇。以時間計，余光中與第十位繆思之間的交往超逾一個甲子（1），可說從少年戀到皓首，從兩小無猜愛到與子偕老，而此情不渝；以幅度計，詩人曾經翻譯過的文類，涉及小說，傳記，詩歌，戲劇，論文，書信等多種，因此對戀人的千姿百態，濃妝淡抹都一一細賞，了然於胸。詩人對戀情的執著，鏗而不捨，歷久彌新，曾自謂對翻譯乃“認真追求，而非逢場作戲”（2），與坊間一般文人閒來偶事翻譯，聊作調劑的作風大不相同；對戀人的態度則尊而重之，愛慕有加，曾宣稱“翻譯乃大道”（3），因此，詩人尊之為“第十位繆思”，較諸其他九位專司靈感與創作之女神，其地位之尊崇，門第之顯赫，毫不遜色。以下試從長度，幅度，深度與態度等方面來剖析詩人與第十位繆思之間的這場永恆之戀。

余光中的文學生涯悠久綿長（4），早於1949年大學時期已經初試啼聲，在廈門《星光》，《江聲》等報刊發表詩作；1952年在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，同年出版第一本詩集《舟子的悲歌》，及開始執筆翻譯海明威(Ernest Hemingway)名著《老人與大海》(*The Old Man and the Sea*)，在《大華晚報》連載，並以第一名考入聯勤陸海空軍編譯人員訓練班，由此可見，余光中的創作和翻譯，幾乎是同步發軔的。不但如此，詩人大學畢業後次年加入國防部聯絡官室服役，出任少尉編譯官，換言之，當時的正業是翻譯，別業是創作，因此，詩人與第十位繆思的確邂逅相交於年少時，此後兩情纏綿，歷經悠悠六十載而恩愛逾恆。

細閱余光中的《文學年表》，就會發現在詩人漫長的文學之旅中，創作和翻譯可說是雙刃出鞘，刀鋒凌厲，互相輝映。二十世紀五十年年代，余光中除了在詩壇上嶄露頭角之外，也翻譯了上述的《老人與大海》，以及伊爾文·史東(Irving Stone)的《梵谷傳》(*Lust For Life*)。六十年代，詩人繼續發表詩作，撰寫散文及文學評論，並開始從事詩歌的翻譯，先出版《英詩譯註》(1960)，繼而與梁實秋，張愛玲，宋淇等人合譯《美國詩選》(1961)，及出版中譯英詩集 *New Chinese Poetry* (1961)，再翻譯出版《英美現

代詩選》(1968)，同時著力撰寫有關翻譯的論文如《翻譯和批評》(1962)，《鳳，鴉，鶉》(1963)，《梁翁傳莎翁》(1967)，《翻譯與創作》(1969)等。七零年代初，先出版中譯英詩集 *Acres of Barbed Wire* (《滿田的鐵絲網》)(1971)，再翻譯出版梅爾維爾(Herman Melville)的小說《錄事巴托比》(*Bartleby the Scrivener*)；至七十年代後期，余光中重新修訂《梵谷傳》，由《大地》改版推出(1978)，並在《聯合報》上發表新譯本譯者序《從慘禍到燦黃——《梵谷傳》》。據悉翻譯家重譯此書，前後耗時一年，修改萬處(5)，終於實現了“少年譯作中年改”的心願(6)。在這十年間，余光中發表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論文如《變通的藝術——思果著《翻譯研究》讀後》(1973)，《哀中文之式微》(1976)，《論中文之西化》(1979)等，點出現代中文逐漸受惡性西化污染的種種問題。八十年代是收穫豐碩的時期，翻譯家開始進軍一個嶄新的領域——戲劇翻譯。王爾德(Oscar Wilde)的《不可兒戲》(*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*)於1983年在台北出版，一年後該劇在香港由香港話劇團演出，大獲好評；1984年則出版《土耳其現代詩選》，詩人並發表《中文的常態與變態》(1987)等文，對中文西化的問題繼續探討。九十年代，余光中出版《守夜人——中英對照詩集》(*The Night Watchman*)(1992)，同年再下一城，翻譯出版王爾德的名劇《溫夫人的扇子》(*Lady Windermere's Fan*)，又成為華文舞台上一齣交口讚譽的絕妙好戲。1995年出版王爾德的《理想丈夫》(*An Ideal Husband*)；1996年應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之邀出席“外文中譯研究與探討學術會議”，發表主題演講《論的的不休》，成為傳頌兩岸三地的譯界名篇。1997年再赴香港中大，出席“兩岸翻譯教學研討會”，發表主題演講《翻譯之教育與反教育》，針砭時弊，痛切要害。邁入二十一世紀之後，余光中教授以七旬高齡，仍靈感泉湧，著譯不輟。2002年1月《余光中談翻譯》在北京出版，同年3月《含英吐華——梁實秋翻譯獎評語集》於台北出版，碩果累累。2008年，翻譯出版王爾德的《不要緊的女人》(*A Woman of No Importance*)，至此，王爾德的四部喜劇，已在余光中手中全部譯畢，成為翻譯版圖上四座前後呼應，耀目生輝的豐碑。2009年再度細校《梵谷傳》，增訂版由《九歌》隆重刊行。踏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，詩人再以兩個暑假的光陰，傾力翻譯出版了《濟慈名著譯述》一書，內容包括濟慈的名詩(十四行詩，抒情詩，頌體，長詩)及書信，在文壇譯壇引起了極大的迴響。

縱觀余光中教授多年來的輝煌譯績，使人感悟到詩人與第十位繆思之間的戀情，恰

似美酒佳釀，甘冽芬芳，越久越醇。余先生曾謂下一個計劃是再翻譯一部文學名著或畫家評傳，心儀的對象有西班牙畫家葛雷柯（El Greco），英國畫家泰納（Turner）等人，華文世界有福的讀者且拭目以待。（7）

余光中翻譯的版圖，幅員遼闊，景觀多姿，主要分小說與傳記，詩歌，戲劇等三大類。在這三大板塊中，小說與傳記的翻譯起步最早，用力極深；詩歌是當行本色，不但譯品數量最為可觀，而且跟詩人本身的創作互補增益，息息相關；戲劇翻譯則是譯途中後期的嘗試，譯家傾情王爾德一人，不惜長年累月與之角力，拔河，以便在才情機智上一較高下。除此之外，余光中在歷年撰寫的大量論文及評論中，凡涉及西方文學理論或經典作品的片段時，往往自己動手翻譯，不假外求，因此翻譯與創作之間的關係，恰似千絲萬縷，彼此牽引，難以分割。有關余光中翻譯的經驗與幅度，在拙文《余光中：三者合一的翻譯家》（1998）中已經闡述，此處不贅。現僅就譯家於二十一世紀發表出版的譯作及舊譯改版，剖析其翻譯多姿多采的面貌，及嚴謹認真的作風。

余光中雖然曾經謙稱翻譯是“寫作之餘的別業”，但是他對自己譯品的要求卻是一絲不苟，精益求精的。力作《梵谷傳》從初譯到一改再改至最後定本，竟超逾半個世紀。這種面對翻譯巍巍高嶺而毫無懼色，不斷鞭策自己以攀登巨峰的決心和努力，跟當行本色翻譯家傅雷三改譯著《高老頭》的執著和勇氣，實在不遑多讓。（8）余光中翻譯的《梵谷傳》之所以與其他譯本不同，除了文筆精煉，忠實流暢之外，最主要的是在詩人譯筆下，畫家梵谷的形象鮮明靈動，呼之欲出。史東在原文中所描述梵谷畫中的色彩，是極為濃郁強烈，既生氣勃勃又騷動不安的，這是一股“淋漓元氣”，觀梵谷畫與賞莫內畫截然不同，而譯者在譯文中著意表現的也就是梵谷畫中這種“腹內蠢蠢欲動”，“氣蟠胸臆”的感覺（9）。余光中在翻譯《梵谷傳》時對於色彩的運用，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譯者的用心所在，是如何重現原著的神髓氣韻，節奏情致，而不斤斤計較於字從意隨的表象，以及直譯或意譯的手法。詩人曾經說過，“翻譯到了更高的層次，不是討論對錯，而是在乎如何體現原著風格的問題。”（10）這固然是翻譯家一向身體力行的主張，但是經歷“少年譯作中年改，中年譯作晚年校”的歷程，因常年砥礪，畢生磨練，對此一說自當更有嶄新的感悟和領會。

余光中翻譯王爾德的戲劇，又是另一種嘗試。翻譯者的高才妙思與原作者的錦心繡口不相伯仲，余光中早在翻譯《不可兒戲》時已經表明“希望我的譯本是活生生的舞台劇，不是死板板的書齋劇”（11），2008年出版的《不要緊的女人》採取了前面三劇翻譯的一貫方針，在在緊扣原著的節奏和動律，把原文中的奇趣諧情，怪問妙答，雙關語，抽象詞等都一一化解，處理得絲絲入扣。余先生認為“曠代才子王爾德的靈感匪夷所思，一無拘束，像在高速公路上倒開飆車”（12），詩翁一向熱愛駕駛，如今以八旬高齡仍駕車上班，一路疾馳而逸興遄飛，文思泉湧，因此跟原作者不但才情相若，且意氣相投，故而在此“與王爾德再次拔河”的過程中，自然戰績彪炳，成就驕人了。

2012年出版的《濟慈名著譯述》是余光中晚近的傑構。譯者首先在序言中闡明選譯的標準，即除了以十四行詩和頌體為主的名篇之外，也選擇了濟慈三個敘事長篇，以示其多才。譯者接著表示：“譯詩，是一件極不討好的工作。天生英文，不是為給人中譯而設的，反之亦然。但是既要譯詩，就得像詩”（13）。為了與第十位繆思相處融洽，相濡以沫，譯者不得不作出種種妥協：其一，在翻譯專有名詞時“酌情精簡”，甚至意譯；其二，翻譯某些“襯托填空之用”的字眼時“斷然捨去，以救句法”；其三，翻譯古典詩時，“在保持中文自然的句法下，盡量按照英文的順勢或倒裝來譯”（14）。《濟慈名著譯述》一書，共分五輯，每輯除了詩歌的譯文，還包括各種詩類的綜述，將原詩的體裁和變體，主題和特色，以及作者創作經過的來龍去脈等詳加剖析，不但是評論濟慈作品不可或缺的研究資料，更是文情並茂，理趣兼備的精彩論著。

余光中處理不同文類的翻譯時，宛如在潛心細賞第十位繆思的濃妝淡抹，千姿百態，面對伊人的一顰一笑，或動之以情，或述之以理，或逗之以趣，總之不惜一切以達到兩情相悅，融洽無間的境界。曾經詢問余光中對所譯的多種作品中，哪一種特別鍾愛？詩人謂：“我譯過的都喜歡，否則也不譯了”（15），在最近一次談話中，再問詩人哪部作品譯來最得心應手，詩人略事沉吟後明確表示：“《濟慈名著譯述》，我畢竟是個寫詩的！”（16）

俄國知名小說家契訶夫在其文學創作備忘錄《契訶夫手記》中，曾經說過一句名言：“伊凡雖然能夠談一套戀愛哲學，但不會戀愛”，（此處“伊凡”泛指俄國普通人）

(17)。這句話若轉變一下語境，改放在翻譯的範疇，倒是一針見血，一語中的！在目前中港台兩岸三地的譯壇上，只會空談理論不懂翻譯，或只事翻譯避開理論的偏執之士比比皆是，能夠真正展示豐碩成果而又提出精湛理論的專家，卻屬鳳毛麟角，而余光中就是其中的表表者！詩人在與第十位繆思的戀情中，不啻是一位既懂戀愛哲學，又能付諸行動的實踐家。

余光中之於翻譯，的確是有實踐有理論的，除了歷年來出版過大量譯著，即“做翻譯”之外，還矢志於“論翻譯，教翻譯，評翻譯，編譯詩選集，提倡翻譯”，故論者稱之謂“六譯”並進(18)。余光中的譯論，與一般不事翻譯的理論家所言的不同之處，乃在於論者既能荷槍實彈，上陣迎敵；又能運籌帷幄，決勝於千里之外。由於身經百戰，故而深諳敵情，對陣之時，自當善用兵法，逐個擊破。余光中出身於外文系，並有多年教授英詩的經驗，故對莎士比亞，彌爾頓，華茲華斯，濟慈，丁尼生，惠特曼，葉芝，佛羅斯特等人的作品耳熟能詳，各家的風格早已滲入詩人的“感性尤其是聽覺的深處”(19)；而對中文的素養和浸淫，卻是“遠從李白和蘇軾的那頭傳過來的”(20)，這種學貫中西，博古通今的背景，自然對翻譯成品的素質產生莫大的影響。詩人早期的譯文，與後期相較，在中文的運用方面，變化宛然可見。詩人提到修改《梵谷傳》時的體會，曾謂：“二十年後回顧起來，毛病自然很多。但我動筆修改的地方毛病出在英文誤解的不過十之三四，而出在中文欠妥的，卻佔了十之六七，因為二十多年來自己筆下的中文已經變了很多，不少複雜彳亍的英文句法，終已有力化解了。”(21)作家在《中文的常態與變態》一文中，道出了中文生態的要訣：“中文發展了好幾千年，從清通到高妙，自有千錘百煉的一套常態，誰要是不知常態為何物而貿然自詡為求變，其結果也許只是獻拙，而非生巧。”(22)可惜此種求變生亂的中文，在坊間的譯品中積非成是，氾濫成災；而飽受歐化影響的譯文體，又進而污染了中文的創作與發展，兩者互為因果，惡性循環，終於造成了今日中文式微的可悲局面。余光中論翻譯，不僅是為弘揚翻譯之道發聲振聵，也是為維護純淨母語而大聲疾呼——優雅的中文絕不能淪為英文的殖民地！(23)

中文的生態既要執意維護，翻譯的用語是否應盡量歸化，使譯文讀來像中文的原創？余光中對此頗有一番體會。首先，他認為“嚴格地說，翻譯的心智活動過程之中，

無法完全免於創作” (24) 但是譯者的創作，既有原作在前，絕不可能如天馬行空，肆意而行，因此翻譯其實是一種妥協的藝術，就如婚姻和政治，雙方在相處或對壘時，都得退讓一步。(25) 這種以退為進，以柔克剛的智慧，其箇中真味，的確要經驗老到的譯家方能悉心體會。

在翻譯的過程中，傳統的直譯和意譯之爭，並無實質的意義，余光中認為翻譯時，對“原文的形式，應盡量貼近。這樣譯者的風格就不會籠罩原文了”(26)，這種“貼譯”的理論，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，可起立竿見影的效用。翻譯時盡量貼近原文，進而揣摩作者風格，從中迴旋周轉，當可在約束中得到發揮，而避免“過猶不及”的弊端。

余光中的翻譯原則，可以“白以為常，文以應變”八字概括之。詩人說：“即使撰寫論文，遇到需要引述經典名言，若徑用白話譯出，總不如文言那麼簡練渾成，一言九鼎”，(27) 善用文言，在翻譯中需要扭緊語氣，銜接句法時，的確是功效卓著的不二法門，筆者在多年實踐翻譯的過程中，每每以此八字真言為圭臬，而在教授翻譯的課堂上，也不時向學生鄭重推介。

余光中的譯論與譯品，相輔相成，等量齊觀，譯者在於第十位繆思的交往過程中，對戀人不但照顧周全體貼入微，而且長年累月情深意摯。

最後談到詩人對待翻譯的態度。余光中曾宣稱，“我這一生對翻譯的態度，是認真追求，而非逢場作戲。”(28) 由此可見詩人除了對第十位繆思尊而重之，呵護備至之外，對身為譯者的自我也期許甚高，要求甚嚴。這種肅穆莊重的宣言，與譯者認真執著的作風，可說是彼此呼應，互相關照的。環顧我國譯壇，名家甚多，但是儘管譯著等身，影響深遠，不少譯家談起翻譯時卻仍然自貶自抑，如楊憲益總是自嘲為“譯匠”——“卅載辛勤真譯匠，半生飄泊假洋人”(29)，或自謙沒有什麼譯論——“我的思想從來邏輯性不強，自己也很怕談理論，所以也說不出什麼大道理”(30)；翻譯《堂吉訶德》而聞名於世的楊絳也說：“我翻譯的書很少，所涉面又很窄。。。。。。但是我翻譯的一字一句，往往左改右改，七改八改，總覺得難臻完善，因此累積了一些失敗的經驗。”(31)；高克毅則謙稱自己是個“愛美的”(amateur)(32)，“我不是名家，只

是個莫“名”其“巧”的翻譯者。”（33）至於其他偶事翻譯的作家，如徐志摩創作之餘翻譯文友曼斯菲爾的作品，邵洵美家道中落後為糊口而勉強翻譯等，則更不曾真心對第十位繆思予以青睞了。

在余光中的心目中，“翻譯乃大道”，絕非坊間誤以為的雕蟲小技，因此除了做翻譯，論翻譯，編譯選集之外，還認真從事教翻譯，評翻譯，推動翻譯的工作。在《論翻譯的教育與反教育》一文中，作者指出“為人師表者也應該時時反省。。。。。。翻譯教師的警惕應該更高，如果自己已習於繁瑣語法，惡性西化而不自知，則一定誤人。翻譯教師若竟染上冗贅與生硬之病，那真像刑警販毒，危害倍增。”（34）這也是如今余教授以八旬高齡，仍然孜孜矻矻，誨人不倦的因由。

余光中對推動翻譯不遺餘力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對《梁實秋文學獎》中翻譯獎的支持與投入。1987年梁實秋先生在台逝世，為紀念他在文壇譯壇的巨大貢獻，“中華日報”設立了該文學獎，余先生自始即參加翻譯獎的出題和評審，迄今不斷。一般獎項，往往經過初審，複審，決審三個階段，至決審時稿件經淘汰已所剩不多，但是梁實秋翻譯獎的來稿卻不設三關，每一份稿件都直接交到決審委員手中，由委員自上午九時評審到黃昏日落，經反覆斟酌，再三沉吟，方才定案。不但如此，余教授更要求各位評委於評後為每篇得獎作品撰寫詳細報告，“我覺得要做到這地步才算功德圓滿，也才算推行了翻譯的“社會教育”，把大學的翻譯課推行到文壇，譯界。”（35）余光中的《含英吐華——梁實秋翻譯獎評語錄》一書，就是積累多年評審經驗的寶貴成果。余教授也是香港中文大學於2000年所創設“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”的活水源頭，參加第一屆翻譯獎的出題和評審，及其後數屆的散文組決審評判迄今。此外，歷年來余教授參與的各類文學與翻譯評審，更不勝枚舉。

回溯余光中在譯壇上的輝煌業績，當會發現譯家之所以成就卓越，由來有自。希臘神話中專司靈感的女神共有九位，名曰繆思，乃宙斯之女，為恩待世人，特來到人間，以學問，藝術，文藝，音樂，雄辯等來教化人類。其中卡萊娥比(Calliope)為敘事詩女神，攸特爾普(Euterpe)為抒情詩女神，哀拉托(Erato)為戀愛詩女神，波麗姆尼雅(Polyommia)為讚美詩女神，美爾波馬妮(Melpomene)為悲劇女神，塔麗雅(Thalia)為喜劇女神，克麗

娥(Cleio)為歷史女神，烏拉妮雅(Urania)為天文女神，特普西科麗(Terpsichore)為舞蹈女神(36)。其實，余光中與第十位女神邂逅之前，早已與其九位姐姐相熟稔知；與伊人相識相戀之時，更不時與九位繆思往返相交。余光中身為詩壇祭酒，兼擅抒情詩，戀愛詩，敘事詩等各種詩體，加以飽讀歷史，擅長戲劇，喜好音樂，酷愛天文，這種稟賦，若非深受九位繆思恩寵眷顧，豈能唾手而得？因此，詩人與第十位繆思的交往之途，既有九位長姊守護引導在前，自可暢順無阻，長驅直入了。

余光中在 2004 年為詩集《守夜人》所撰的新版自序中謂：“感謝永遠年輕的繆思，尚未棄一位老詩人而去。”(37)繆思既永遠年輕，詩人又何以獨老？於是又寫道：“詩興不絕則青春不逝，並使人有不朽的幻覺”(38)。觀乎余光中教授的畢生成就，無論在詩歌，散文，評論，翻譯等方面皆出類拔萃，是為作家創作的四度空間。其中僅以翻譯一項，跟當行本色的翻譯家相較，就已經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足以流芳百世了。

余光中與第十位繆思之間的情誼，是永恆之戀，不朽之愛；詩人在靈感女神的眷顧下，創作不輟，青春不逝，而絕非幻覺。

註釋

1. 封德屏，總策劃，陳芳明編選，《余光中》，《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》34，（台北：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，2013年），見“文學年表”。
2. 見余光中《翻譯乃大道》一文，《余光中集》（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第九卷，頁189。
3. 同上。
4. 下列的余光中譯著資料，主要參考註釋1所列“文學年表”，凡有缺漏處，則參閱多種其他資料填補之。
5. 余光中，《梵谷傳》（台北：大地出版社，1978年），《新排版序》，頁17。
6. 余光中認為“少年譯作中年改，翻譯是可以愈老愈好的”，見金聖華，《認識翻譯真面目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2002年），頁127。
7. 2015年初，余光中教授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，來港主持第二十八屆“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”，筆者有幸向余先生請教有關未來翻譯計劃的問題。
8. 傅雷名譯巴爾扎克（Honoré de Balzac）的《高老頭》（*Le Père Goriot*）曾先後譯過三次，即1946年初版，1951年改譯，1963年重譯。
9. 見余光中譯，《梵谷傳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09年）譯者註，頁484。
10. 余光中於2014年11月30日應邀出席於台北舉行的“紀念嚴復誕生160週年文學翻譯研討會”，這是他發表主題演講中的論點。
11. 余光中，“與王爾德拔河記——《不可兒戲》譯後”，見金聖華，黃國彬主編，《因難見巧——名家翻譯經驗談》（台北：書林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19。
12. 余光中譯，《不要緊的女人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“譯後”，頁140。
13. 余光中譯，《濟慈名著譯述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12年）“譯者序”，頁6。
14. 同上，頁7-8。
15. 金聖華，《認識翻譯真面目》，頁119。
16. 余光中2015年3月來港訪問期間有關翻譯的對話。
17. 賈植芳譯，《契訶夫手記》（杭州：浙江文藝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4。
18. 單德興，《余光中教授訪談錄：翻譯面面觀》，《編譯論叢》第六卷，第二期（2013年9月），頁177。
19. 余光中“先我而飛——詩歌選集自序”，《余光中詩歌選集》第一輯（長春：時代文

- 藝出版社，1997年)，頁3。
20. 同上。
 21. 余光中譯，《梵谷傳》，“新排版序”，（台北：大地出版社，1978年），頁16-17。
 22. 余光中，“翻譯的常態與變態”，見《翻譯乃大道》（北京：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224。
 23. 余光中，“變通的藝術——思果《翻譯研究》讀後”，見《余光中集》，第五卷，頁238。
 24. 余光中，“翻譯與創作”，見《余光中集》，第五卷，頁92。
 25. “余光中：翻譯如婚姻必須妥協”，見中央社記者林思宇訪談錄：2012/04/28。
 26. 金聖華，《認識翻譯真面目》，頁121。
 27. 余光中，“創作與翻譯——淡江大學五十週年校慶演講”，見《余光中集》，第九卷，頁547。
 28. 余光中，《翻譯乃大道》，頁195。
 29. 金聖華，《有緣。友緣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2010年），頁287。
 30. 《因難見巧》，頁109。
 31. 同上，頁93。
 32. 《有緣。友緣》，頁263。
 33. 《因難見巧》，頁75。
 34. 《余光中集》，第九卷，頁533。
 35. 《余光中集》，第九卷，頁531。
 36. 馮作民譯著，《西洋神話全集》（台北：星光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172-174。
 37. 余光中，《守夜人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17。
 38. 同上。